

#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 “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银培菽

**内容提要：**数字化革命带来了经济繁荣，加强了国家间的数字相互依赖，也赋权于一批聚集于硅谷的“科技精英”。执行业之牛耳的科技精英们有独立的政治偏好，他们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既有文献注重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省略或轻视了个体精英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施动性。文章建构了一个以结构性权力来解释科技精英的个人政治影响的理论框架——科技精英掌握着较强的生产和知识结构性权力、较弱的金融和安全结构性权力。他们一方面对权力进行“跨结构转化”，另一方面也借助“金智复合体”机制来实现政治影响。结合两种机制，科技精英致力于将“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国内和国际政治议程。通过对元宇宙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国内政治中的“扎克现金”、左翼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元连接”、天秤币、卫生治理、气候治理等六项行动的过程追踪，文章阐释了上述机制如何被付诸实践。尽管科技精英不会撼动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但仍 在争取对 Web 3.0 时代去中心化的网络活动和“虚拟—现实交互式”空间（元宇宙）的领导权。具有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科技精英越多，对现存民族国家框架的潜在挑战越大。

**关键词：**数字相互依赖 金智复合体 结构性权力 自由世界主义 元宇宙

**作者简介：**银培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

\*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宗教类基金会智库复合体的政治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CZJ003）和“2022年复旦大学咨政研究支持计划”的资助。感谢《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及建议，文责自负。

## 一、引言

广义的科技精英包括一切因为科学技术优势而取得高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官僚等。但是，美国语境下的“科技精英”有很强的指向性，是指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ICT）数字化革命而创业成功的一批跨国公司领导者，如盖茨、扎克伯格、马斯克、贝索斯等。由于其公司总部或创立地点多数在硅谷（Silicon Valley），科技精英也时常被叫作“硅谷精英”。科技精英的“富可敌国”名不虚传——在 2021 年全球财富排名榜上，前 10 位中有 8 位是科技精英，其资产之和高达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排名第 15 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sup>①</sup>

以高科技跨国公司为身份标识的科技精英在获得财富与声望的同时，也招致怀疑与非议。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及其负责人加强审查和规训，使“科技精英威胁国家”的说法引起物议沸腾。2020 年，美国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联合对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硅谷科技公司强化审查，脸书公司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式起诉，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多次被要求到国会作证。<sup>②</sup>可是在审查、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多重压力下，科技精英的财富依然保持韧性增长。<sup>③</sup>于是，卢梭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左翼政治家的带动下把矛头对准科技精英，将民主和公平的危机归咎于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公司。<sup>④</sup>另一方面，美国又在经济、技术乃至政治上十分仰仗科技精英。“富可敌国”的科技精英掌控的企业以硅谷为核心形成集聚效应，对全球地缘经济有辐射作用。拜登政府发起“印太数字发展议程”，硅谷与日本的民

①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https://www.bloomberg.com/billionaires/>.

② Cristiano Lima and Aaron Schaffer, “Congress Wields Subpoena Power on Silicon Valley”,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17, 2022.

③ 2021 年 1 月，科技亿万富翁的净资产为 2.5 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约 80%，超过任何其他行业。“Forbes Billionaires 2021: The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ttps://www.forbes.com/billionaires/>.

④ “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激进，后者主张用国家力量来约束私营部门的过分扩张，维护公共利益；而前者则要求改革资本主义，进行平均化的社会再分配。参见 Jerry Z. Muller, “The Neosocialist Delusion: Wealth Is Not the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1, 2020.

□ 当代亚太

间层面合作成为美日合作复苏的新支点。<sup>①</sup> 英特尔公司以千亿美元打造的半导体基地成为拜登对乌克兰的国情咨文中吹嘘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噱头。<sup>②</sup> 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使美国的近地轨道飞行任务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sup>③</sup>

并非所有的“科技精英”都有政治诉求，但一部分有强烈意愿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的科技精英，是本文试图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他们有的投身公益慈善，试图以财富和技术来解决公共难题，有的通过商业活动和慈善捐赠来间接或直接地介入美国和全球的政治事务。之所以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是因为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共性，在政治上集结成一个笃信技术专家主义、以科学和数据为指南的“硅谷政治学派”。<sup>④</sup>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聘请了大量硅谷科技公司及其关联性慈善机构的高管入职白宫。单是“陈·扎克伯格倡议”（CZI）的职员就有5人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数字服务、情报等部门，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有关科技精英与“深层国家”的种种猜测。<sup>⑤</sup>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那些有政治诉求的科技精英对本国和全球政治事务产生的影响？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一个科技精英在个人层面施加跨国政治影响的理论框架——在数字相互依赖中，科技精英直接获得生产和知识的结构性权力。这两种结构性权力可以部分转化为金融和安全的结

---

① Kenji Kushida, “How Silicon Valley Can Drive Closer U. S. -Japan Collabor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 9,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3/09/how-silicon-valley-can-drive-closer-u.-japan-collaboration-pub-86601>.

② Politico Staff, “Full Text: Biden State of the Union 2022 transcript”, Politico, Mar. 1,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3/01/biden-state-of-the-union-2022-transcript-full-text-00013009>.

③ 自从2011年NASA的宇宙飞船退役，美国一直向俄罗斯购买服务来完成近地轨道货物和乘员运输。为降低成本、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宇航局近十年来大幅度提高预算以开发商业载人运输系统，SpaceX在与波音公司的竞争中胜出。参见王霄：《2016年国外载人航天发展回顾》，载《国际太空》2017年第2期，第8~15页；Morgan McFall-Johnsen and Dave Mosher, “SpaceX has Proven It Can Fly Astronauts. Here’s How Elon Musk’s Company Became the First to Help NASA Resurrect US Spaceflight”, Inside, Aug. 6, 202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spacex-boeing-nasa-commercial-crew-program-launch-astronauts-2020-1>.

④ Max Chafkin, *The Contrarian: Peter Thiel and Silicon Valley’s Pursuit of Pow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1, pp. 1-9; Chrystia Freeland, “Plutocrats vs. Populists”, *New York Times*, Nov. 1, 2013.

⑤ 参见本文附录。

构性权力，也可以衍生金钱和观念资源并投入到美国运作成熟的金智复合体机制中。这两种途径都能够让科技精英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通过扎克伯格及其金智复合体推动“自由世界主义”议程的案例，本文阐释了上述多种机制如何被付诸实践。

## 二、文献回顾

国际政治理论有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但既往解释数字化革命与科技行业的理论多从前两个层次出发，相对忽视第三个层次。近年来兴盛的新理论中，“数字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关注国家被技术削弱的新理论；“技术民族主义”是国家层次上探讨如何对技术进行主权性管理的新理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科技精英个人层次的施动性。

### （一）体系层次：数字相互依赖

数字化革命正如 18 世纪的蒸汽机革命和 19 世纪的电力革命一样，推动了现代全球价值链的形成。<sup>①</sup>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远程分工和协调，引导中间产品和服务沿着价值链多次跨越国界。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估计，大约 80% 的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有关。<sup>②</sup> 一方面，新的全球价值链打破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多极化”和“东升西降”的趋势凸显；<sup>③</sup> 另一方面，少数“明星公司”主导了大部分国际贸易。<sup>④</sup> 其中，产品和服务都高度虚拟化的科技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优势。根据全球 IT 行业贸易协会“CompTIA”的数据，2010 年至 2019 年间，美国科技行业的 GDP 增长了 66%，共计增加 7455 亿美元的产出。2020 年 4 月，美国科技行业以 1.9 万亿美元的规模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 10%，是仅

---

① Andrew B. Bernard, J. Bradford Jensen, Stephen J. Redding and Peter K. Schott, “Global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56, No. 2, 2018, pp. 565-619.

②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201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13\\_en.pdf](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13_en.pdf).

③ 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9 期，第 26~46 页。

④ Grace Ballor and Aydin B. Yildirim,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22, No. 4, pp. 573-586.

□ 当代亚太

次于制造业和政府的第三大经济部门。<sup>①</sup>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阻碍了实体产业链的流通，却给经营数字产业的跨国公司带来机遇。

数字革命加深了全球性的“数字相互依赖”。<sup>②</sup> 它触发了一系列的全球治理问题，首先是削弱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跨国公司在整个价值链中具有中枢性作用，它们将原来与发达经济体捆绑在一起的工作外包给更偏远的发展中地区，让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东道国和投资国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角色被弱化。<sup>③</sup> 其次，数字相互依赖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形成所谓的“数字鸿沟”。<sup>④</sup> 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在加速被数字化经济淘汰，形成“技能鸿沟”。<sup>⑤</sup> 垄断性增强、碳排放加剧也是常见问题。<sup>⑥</sup> 另外，“元宇宙”削弱了地理和物理上的限制，进一步加强了数字相互依赖的效应。全球互联网正在从 Web 2.0 创新曲线的中后期向 Web 3.0 过渡，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VR/AR）的技术使物理感官与虚拟体验的交互变得可能。借助可穿戴设备获得视听甚至触觉的物理体验，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并与其他人互动。国家的监管和约束在 Web 3.0 的数字相互依赖背景下将面临更多棘手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数字相互依赖挑战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sup>⑦</sup> 随着

---

① *Cyberstates 2020,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the U.S. Tech Industry and Tech Workforce*, CompTIA, p. 7, [https://comptiacdn.azureedge.net/webcontent/docs/default-source/research-reports/comptia-cyberstates-2020.pdf?sfvrsn=39494164\\_0](https://comptiacdn.azureedge.net/webcontent/docs/default-source/research-reports/comptia-cyberstates-2020.pdf?sfvrsn=39494164_0).

② Edward D. Mansfield and Nita Rudra,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558-585.

③ Jayanth Jayaram, Shawnee K. Vickery and Cornelia Droge,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frastructure and Process Improvements on Supply-Chain Time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 Logistics Management*, Vol. 30, No. 3, 2000, pp. 314-330.

④ 胡鞍钢、周绍杰：《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34~48页；杨蒙莺、陈德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载《现代管理科学》2003年第11期，第9~10页。

⑤ Carolina Feijao, Isabel Flanagan, Christian Van Stolk and Salil Gunashekar, “The Global Digital Skills Gap: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RAND Corporation, 2021,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533-1.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533-1.html).

⑥ Neil Lee and Clarke Stephen “Do Low-Skilled Workers Gain from High-Tech Employment Growth? High-Technology Multipliers, Employment and Wages in Britain”, *Research Policy*, Vol. 48, No. 9, 2019, pp. 1-19.

⑦ Edward D. Mansfield and Nita Rudra,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权力从国家向公司转移，国家监管和协调社会问题的能力会遭到抑制。约翰·杰拉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提出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是多边主义与国内干预、自由主义与社会正义的结合。如果国家的干预能力遭到抑制，那么国际秩序就会滑向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对秩序中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难以为继。<sup>①</sup> 在现实中，传统行业和低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难以承受数字革命的冲击，其结果就是转化为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动荡力量。<sup>②</sup>

## （二）国家层次：技术民族主义

关于数字相互依赖的后果，基于国家层次的技术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最受中文文献关注的话题。<sup>③</sup> 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在技术的冲击下会采取主动战略，虽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自由主义），但更注重增强本国在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现实主义）。广义的技术民族主义包括所有与技术高度相关的产业。<sup>④</sup> 具体到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民族主义认为战略竞争的本质不变，但内容变了，表现为对数据、半导体、人工智能、第五代通信（5G）等技术的争夺。竞争的“棋子”变为谷歌、苹果、脸书、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sup>⑤</sup> 事实上，技术民族主义并不新鲜，在网络空间治理刚刚兴起时，国家就对数字空间中的“无政府状态”实行监控和干预，以塑造全球网络空间，形成有利于本国的网络空间环境。<sup>⑥</sup> 阎学通等认为，我们目前处在数字时代的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这种竞

---

①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379-415.

② J. Lawrence Broz, Jeffry Frieden and Stephen Weymouth, “Populism in Place: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464-494.

③ 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第59~89页；林娟岚：《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苏联、日本的高技术遏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130~154页；李峥：《全球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第31~39页；刘国柱：《特朗普政府技术民族主义论析》，载《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第45~67页。

④ 黄琪轩：《“振兴的机遇”与“失去的机会”——美日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技术转移与亚洲经济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106~129页。

⑤ 郎平：《数字时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特点》，载《战略决策研究》2021年第3期，第85~100页。

⑥ 沈逸：《应对进攻型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挑战——析中美在全球信息空间的竞争与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69~79页。



□ 当代亚太

争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sup>①</sup>

技术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它预设了科技行业的政治立场会主动或被动地服从于国家利益，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硅谷的起步依靠美国国务院和军队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产物。<sup>②</sup>但硅谷很快发展为一个高度自由多元化的企业集群，完全背离了它的国家主义起源。当硅谷的数字化产业成熟，共和党及美国商会多次向它抛出橄榄枝，希望将硅谷整合进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但是直到特朗普上任，共和党与硅谷之间的关系仍旧很疏离。<sup>③</sup>这些证据都说明，硅谷的科技精英既没有服从于军工复合体，也没有并入共和党的商业利益集团，他们在政治上有“自己的想法”。

忽视科技精英个人层面的作为将阻碍我们把握国际关系的全貌。政治传播学已经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科技公司对政治的影响。<sup>④</sup>既然这些公司和平台在政治上如此重要，我们如何能够忽视那些控制它们的人？科技公司的掌舵人有多重性身份，他们的社会性身份甚至有时强于他们的商业头衔。例如，盖茨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慈善事业，他从2007年至2015年访问中国12次，有8次都是以盖茨基金会主席的身份。<sup>⑤</sup>研究美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对普京和特朗普都十分熟悉，可是研究科技公司的人却对盖茨、扎克伯格在公司和商业以外的行为知之甚少。

### （三）个人层次：“黑客慈善”

在个人层面，科技精英以一种非常独立的渠道来参与政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黑客慈善”。脸书前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从数字革命中获得财富的第一代科技巨头应该通

---

① 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第24～55页。

② Stephen B. Adams, “Arc of Empire: The 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 the U. S. Navy, and the Beginnings of Silicon Valle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91, No. 2, 2017, pp. 329-359.

③ Neil Munro, “Why the GOP is Courting the Valley”, *National Journal*, Vol. 30, No. 27, Jul. 4, 1998, pp. 1582-1583.

④ Daniel Kreiss and Shannon C. McGregor, “Technology Firms Shap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Work of Microsoft, Facebook, Twitter, and Google with Campaigns during the 2016 U. S. Presidential Cy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35, No. 2, 2018, pp. 155-177.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检索“盖茨”的结果统计。

过“黑客慈善”来改变世界。<sup>①</sup> 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成为科技精英之间相互认可的一种说法。黑客文化是一种政治参与模式，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的“宣传”概念和信息流动权。互联网成为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工具，也开辟了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互联网黑客在政治上是乌托邦现实主义者。<sup>②</sup>

黑客慈善是一种黑客文化与慈善事业的组合方案，也就是用“黑客”的方法来捐赠财富。从 2020 年美国慈善捐赠排行榜来看，前 25 位中有多达 14 位来自科技行业。<sup>③</sup> 美国精英热衷慈善捐赠并不稀奇，但是科技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区别在于“黑客精神”——传统慈善比较强调公民性和地方性，科技精英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影响力”和“大问题”上，认为“破坏传统模式并进行创新”很重要。<sup>④</sup> 帕克指出，这种慈善模式与黑客文化有某种联系——黑客的特长是发现系统漏洞并进行修补，极度追求量化、抽象和系统化。相应地，黑客慈善瞄准疾病、气候变化等技术难度高、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较少受理个体的救助需求。<sup>⑤</sup> 黑客慈善也依赖模型和大数据算法，类型化和简化人类的多元需求。他们很少“怜贫惜弱”，对扶贫、家庭虐待、精神疾病等人类基础需求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偏好可量化的、不需要人工干预、不涉及道德判断的问题。<sup>⑥</sup>

“黑客慈善”毫不避讳对政治的干预。帕克被多次引用的一句话是：“政治干预可能看起来有些肮脏，但宏大问题必然触及政治层面。”<sup>⑦</sup> 扎克伯格在

---

① 肖恩·帕克夫妇于 2015 年捐赠 6000 万美元成立“帕克基金会”。参见 Sean Parker, “Sean Parker: Philanthropy for Hacker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 26, 2015,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an-parker-philanthropy-for-hackers-1435345787>.

② Andrew R. Schrock, “Civic Hacking as Data Activism and Advocacy: A History From Publicity to Open Government Data”, *New Media & Society*, Vol. 18, No. 4, 2016, pp. 581-599.

③ 其中前两名捐赠者占 25 人捐赠总额的 67%，分别是杰夫·贝佐斯 (Jeff Bezos) (102 亿美元) 和麦肯齐·斯科特 (MacKenzie Scott) (57 亿美元)。“The Philanthropy 50”, *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Feb. 9, 2021, [https://www.philanthropy.com/article/the-philanthropy-50/#id=browse\\_2020](https://www.philanthropy.com/article/the-philanthropy-50/#id=browse_2020).

④ Alexa Cortés Culwell and Heather McLeod Grant, “The Giving Code: Silicon Valley Nonprofits and Philanthropy”, Open Impact LLC, 2016, p. 31, [https://openimpact.io/wp-content/uploads/2022/05/GivingCode\\_full\\_download\\_102516.pdf](https://openimpact.io/wp-content/uploads/2022/05/GivingCode_full_download_102516.pdf).

⑤ Sean Parker, “Sean Parker: Philanthropy for Hackers”.

⑥ Justin Torres and Karl Zinsmeister, “The Calculating Philanthropy of Silicon Valley”, *Philanthropy Roundtable*, 2018, <https://www.philanthropyroundtable.org/magazine/the-calculating-philanthropy-of-silicon-valley/>.

⑦ Sean Parker, “Sean Parker: Philanthropy for Hackers”.



□ 当代亚太

回答为什么聘请政治活动家来管理他的慈善组织时也说：“政治工作有助于慈善目标的实现，毕竟国家拥有的资源比任何私人组织多得多。”<sup>①</sup> 一个最新的证据是，科技精英通过慈善捐赠对 2020 年的美国选举结果发挥了重大作用，除了与传统慈善机构一样动员投票、改变议题叙事以外，科技精英着力在社交媒体、数字竞选广告上下功夫。<sup>②</sup>

因此，慈善是研究科技精英个人层面的政治影响最关键的切入点。<sup>③</sup> 有丰富文献显示，美国财富精英长期通过慈善事业影响公共政策、催化社会变革。<sup>④</sup> 在经济学中，存在“慈善资本主义”概念，其与“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互为映照。<sup>⑤</sup> 政治学则关注慈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如何在美国内政和外交决策中发挥实质性影响。<sup>⑥</sup> 有学者认为，整个美国的慈善行业已经脱离底层，不太追求社会的公平和进步，上层的价值观和偏好支配着整个行业。<sup>⑦</sup> 慈善事业为党派竞争间接投入的金钱越来越多，采用的

---

① Mike Isaac,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Builds Political Muscle for Philanthropic Work”, *New York Times*, Jan. 10, 2017.

② Philip Rojc, “Perfectly Legal: Eight Ways Charitable Cash is Shaping the 2020 Election”, *Inside Philanthropy*, Feb. 2020, <https://www.insidephilanthropy.com/home/2020/2/7/perfectly-legal-eight-ways-charitable-cash-is-shaping-the-2020-election>.

③ Robin Rogers, “Why the Social Sciences should Take Philanthropy Seriously”, *Society*, Vol. 52, No. 6, 2015, pp. 533-540.

④ Carl J. Schramm, “Law Outside the Market: The Social Utility of The Private Found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Vol. 30, No. 1, 2006, pp. 355-415.

⑤ Matthew Bishop and Michael Green, *Philanthrocapitalism*,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0, pp. 117-119; Linsey McGoey, “The Philanthropic State: Market-State Hybrids in The Philanthrocapitalist Tur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5, No. 1, 2014, pp. 109-125.

⑥ Rob Reich, *Just Giving: Why Philanthropy is Failing Democracy and How It Can Do Bet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Megan E. Tompkins-Stange, *Policy Patrons: Philanthropy,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 Cambridge: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20;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Parmar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Joan Roelofs, *Found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Mask of Plura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⑦ David Callahan, *The Givers: Wealth, Power,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7, p. 119.

形式也愈加复杂。<sup>①</sup> 科技精英用慈善来争夺美国政治高地的做法越来越常见。<sup>②</sup> 超过一半的美国慈善精英（56%）有政治抱负，并通过慈善捐赠或直接的选举捐赠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sup>③</sup>

综上所述，数字相互依赖理论关注到了技术对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冲击，但没有超出反思新自由主义的范畴，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旧瓶装新酒”。而技术民族主义的问题是，它轻视了硅谷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精英群体的主体性：硅谷早早背离了它诞生时所属的军工复合体，也从未被整合进美国商业利益集团，与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关系疏离。硅谷精英很难听从一个集中的“国家意志”，何况这个国家已经因为政治极化、府院之争而深度撕裂。相比之下，“黑客慈善”提供了一种新的线索，它捕捉到科技精英极具个性化的政治参与方式。然而，科技精英自己书写的黑客慈善叙事停留在现象层面，并具有乌托邦主义成分；而美国学术界有关慈善政治的文献又很少有聚焦科技精英这一群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将结合二者视角，提出一个有兼容性的理论框架。

### 三、科技精英的个人政治影响

本文提出了一个科技精英从个人层次施加跨国政治影响的推论。科技精英的个人权力本质上是从数字相互依赖中直接获得的“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分为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四种，科技精英掌握最前沿技术的原理与应用，凭借技术突破建立全球性的跨国公司，直接掌握知识（强）和生产（强）两种结构性权力。但金融（弱）和安全（弱）这两种结构性权力是科技精英的短板，他们并不能先天具有这两种结构性权力。科技精英实现政治抱负有两种做法，其一是将某种结构性权力转化为另一种结构性权力，其二是将结构性权力的衍生资源投入本国政治的成熟机制。两种做法的本质都是行动者对手中的直接资源进行各种形式的转化、兑换与分配，以突破现有结

---

① David Callahan, *The Givers: Wealth, Power,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 p. 64.

② Sarah Reckhow, “More than Patrons: How Foundations Fuel Policy Change and Backlash”,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9, No. 3, July 2016, pp. 449-454.

③ Kristin A. Goss, “Policy Plutocrats: How America’s Wealthy Seek to Influence Governa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9, No. 3, July 2016, pp. 442-448.

□ 当代亚太

构的限制，在更大的结构中对本国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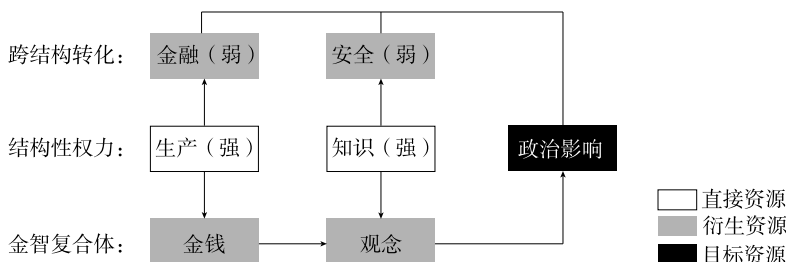


图1 科技精英的个人政治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一) 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是一种惰性权力，或者是“不大看得出的权力”。<sup>①</sup> 它不同于在关系中迫使其他行为体改变的联系性权力 (relational power)，而是通过行为体的规模及其对结构的塑造能力，缩小或扩大其他行为体的选择范围，从而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约束性的影响。结构性权力可以“限定结构、选择竞赛种类、设置竞赛规则”，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sup>②</sup>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认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基础性的结构性权力有四种：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

斯特兰奇强调，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不一定是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拥有结构性权力。她特别提到，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从经贸层面发现了国家的结构性权力，但遗憾在于没有进一步诘问：非国家行为体有什么结构性权力？<sup>③</sup> 数字相互依赖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红利在 21 世纪大大赋权了科技精英，使他们自然获得了生产和知识两种结构性权力。首先，科技精英的跨国公司是全

①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Michael Barnett & Raymond Duvall eds.,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2.

②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7 页。

③ 同上，第 40 页。

球经济结构中的关键主体，科技精英的生产结构权力不言而喻。其次，在知识结构中，科技精英不仅在互联网、高端制造业，甚至在这些产业背后的基础科学领域占有前沿地位，也因为他们的“技术神话”而在哲学和价值观上具有很强的魅力，是“Z世代”崇拜和模仿的对象，这赋予他们知识结构权力。

事实上，金融和安全结构仍然由主权国家和传统行业精英牢牢控制，这导致科技精英的四种结构性权力是不平衡的——虽然生产和知识权力很强，但金融和安全权力很弱。控制着全球金融结构的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主义机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华尔街金融企业。这些机构依托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国政府对金融利益集团的依赖。全球安全结构则几乎由主权国家垄断。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等政治学家看来，国家是“典型的收保护费的组织”“支配性的保护性社团”。<sup>①</sup>安全是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也是国家起源的主要原因。<sup>②</sup>因此，四种结构性权力中，金融与安全比生产和知识更加“硬核”，是最贴近政治的权力，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本身。

## （二）跨结构转化

既然金融与安全结构是国家的“自留地”，那么科技精英是否甘于在现有的生产与知识结构中“知足常乐”呢？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科技精英手中的结构性权力具有越来越强的延展性。机会窗口不断出现，使科技精英尝试从生产与知识结构跃迁到金融与安全结构，实现权力的“跨结构转化”。

首先是生产结构权力拓展至金融结构。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线上支付的重要性提高，大大提升了科技行业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和国家的议价能力。金融机构不得不主动地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结算方式，而国家也要对金融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深度改革。随后，数字货币的横空出世更强烈冲击了传统意义上由主权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数字货币的底层逻辑是区块链技

<sup>①</sup> 参见伊恩·路德、尼尔·沃克：《安全的文明化》，张熹珂、任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201页。

<sup>②</sup> 在自然状态下人人互相为战，出于多数人的考虑和需要，签订契约谋求自身的安全，国家因此建立。参见彭冬艳：《关于国家起源的比较——以〈利维坦〉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研究蓝本》，载《理论观察》2016年第8期，第5~7页。

## □ 当代亚太

术，它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性的特征，以密码学算法为安全保障。而科技精英的前身“黑客”，是世界上最早一批掌握和应用这些技术的群体。这些技术也早已融入科技精英的商业帝国，是科技精英生产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包括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等在内的全球数字货币已多达 1500 余种，全球总市值曾一度高达 3891 亿美元。<sup>①</sup>

其次是将知识结构性权力拓展至安全结构。全球安全结构可以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部分。非传统安全方面，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大大增加了网络战争的风险和破坏力，网络空间军事化已成不争的事实。这强化了科技精英在非传统安全结构中的影响力，因为科技精英对互联网环境有强大的塑造与控制能力。2018 年，微软联合了脸书、思科等 34 家科技巨头签署《网络科技公约》，承诺加强技术合作，加强对网络攻击的联合防御，不卷入由政府发动的网络安全攻击。<sup>②</sup> 传统安全方面，科技精英也一样有所建树。信息技术外溢到高端制造业，最尖端的技术常常在产业界直接变现。在太空飞行、登月计划中，美国政府出于成本和技术的双重考虑，与马斯克、贝索斯等科技精英开启了公私合作。<sup>③</sup>

跨结构转化只在私有化程度高、国家角色淡化的领域容易成功。如果国家在某些领域里鼓励或允许私有化力量介入，科技精英就可以直接施展其掌握的生产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权力。否则，它带来的麻烦就比好处更多。例如，互联网政治运动、“数字外交”都瞄准社交媒体作为政治动员工具，而科技精英作为平台的负责人要承担风险，一旦平台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没有做到“政治正确”，或是对负面舆情约束不力，就要被迫代表平台承担责任，并且要首先向美国政府汇报。科技精英虽然具有将社交媒体（生产结构）的权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安全结构）的潜力，但是绝不会轻易这样去尝试。甚至可以说，科技精英将“无意中”获得的一部分安全结构权力已经主动让渡给了美国政府。

### （三）金智复合体

在公有化程度高、国家角色强势的领域，科技精英需要按照传统的游戏

① 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第 84~106 页。

② 郎平：《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关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2 期，第 90~121 页。

③ “NASA Provides Update to Astronaut Moon Lander Plans Under Artemis”，NASA，Mar. 22，2022，<https://www.nasa.gov/press-release/nasa-provides-update-to-astronaut-moon-lander-plans-under-artemis/>。

规则来参与政治。在众所周知的“军工复合体”精英政治机制中，科技精英没有优势。但近年来，美国政治出现一种比较显著的“金智复合体”机制，科技精英在其中的优势很明显。理论上，金智复合体机制指原本各自独立影响政治的“金钱—政治”和“观念—政治”关系链转变为协同性的“金钱—观念—政治”的三元关系链。这种关系链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往往有知识盲区或摇摆空间。观念塑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决策者态度与政策结果。然而，知识生产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高度私有化的，科学研究、政策辩论、精英社交等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捐赠者为这些活动提供资源，一方面可以影响政策结果，另一方面以资助观念作为中介，可以隐匿身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sup>①</sup>如前所述，科技精英的权力在生产 and 知识结构中表现突出，匹配了“金钱”和“观念”两种资源。

金智复合体的主要形式是慈善捐赠，它区别于“政治捐赠”，后者是在选举过程中直接向候选人捐款。政治捐赠有强烈的党派性指向，等于承认了与党派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观念层面影响受众的能力不强，强化了“金”的一面而弱化了“智”的一面。相反，慈善捐赠并不谋求影响政策制定者的人选，而是致力于在长周期内、从具体议题上改变政策制定者的观念，近年来饱受关注的“暗金政治”就是聚焦这种捐赠。<sup>②</sup>慈善捐赠最大程度上融合了“金”和“智”的功能，是金智复合体机制的集中体现。慈善捐赠的信息透明度较低，需要通过复杂的报税信息、捐赠者主动公开或第三方数据库才能查询。这样，捐赠的精英很容易隐匿资金源头，而下游的组织获得捐赠后可以推动某种取向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操作上，金智复合体在美国的政治与外交中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政治现象。金智复合体包括了一系列具体实践，以捐赠机构为基本单位，金智复合体可以独立运作，也可以融入更大的捐赠圈。

捐赠者个人或家族的捐赠机构常常构成一个独立的金智复合体，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的一系列基金会。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创办的“开放

---

① 银培菽：《“金智复合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克制主义转向》，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67～99页。

② Jane Mayer and Dark Mone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Billionaires behi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7.



□ 当代亚太

社会基金会”也有分支机构遍布世界 120 多个国家。<sup>①</sup> 科赫兄弟在美国国内打造的基金会、智库和倡导组织构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动员机器，被称为“科赫章鱼”（Kochtopus）。<sup>②</sup> 科技精英当中也不乏独立的金智复合体，例如，易趣（eBay）创始人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独立创办的 10 个捐赠机构形成了“奥米迪亚集团”。<sup>③</sup>

不同捐赠者的捐赠机构也可以融合成混合型金智复合体。政治极化就是催生混合金智复合体的一种动力。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通过长期研究发现，美国以左右意识形态为纲，形成了两个大型捐赠集团（donor consortia）：右翼是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领导的科赫研讨会（Koch Seminar），左翼是索罗斯等人领导的“民主联盟”（Democracy Alliance），二者在社会层面复刻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极化局面。<sup>④</sup> 此外，族裔、宗教也是融合因素，“美国穆斯林社区基金会”于 2016 年成立后，在五年内孵化了 8 个捐赠圈，主持着 8 个非营利捐赠基金，<sup>⑤</sup> 并发展出“新美国穆斯林妇女捐赠圈”。

## 四、硅谷金智复合体

从话语到行动，硅谷的科技精英都明确表达了想通过捐赠来产生政治影响的意愿。硅谷常见的捐赠机构有三类：501（c）（3）基金会、<sup>⑥</sup> 有限责任

---

① “Offices and Foundations”，Open Society Foundation，<https://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who-we-are/offices-foundations>.

② Schumpeter, “Dissecting the Kochtopus”, *The Economist*, June 7, 2014,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4/06/07/dissecting-the-kochtopus>.

③ Omidyar Group, <https://www.omidyargroup.com/organizations/>.

④ 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Vanessa Williamson and Theda Skocpol, “When Political Mega-Donors Join Forces: How the Koch Network and the Democracy Alliance Influence Organized U. S. Politics on the Right and Left”,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2, 2018, pp. 127-165.

⑤ Muhi Khwaja, “Giving While Muslim”, *IslamiCity*, Apr. 28, 2021, <https://www.islamicity.org/77870/giving-while-muslim>.

⑥ 美国税务局（IRS）对非营利组织有几十种分类，501（c）（3）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包括基金会、智库、医院等等。501（c）（3）组织的资金必须用于服务社会，不能影响竞选和立法，但可以从事观念、教育类活动。参见银培菘：《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3~66 页、第 307~308 页。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

公司 (LLC) 和捐赠者建议基金 (DAF)。501 (c) (3) 是非营利免税组织, 无论是亲自创办还是向其捐款, 都可以返还税收优惠, 但有披露财务信息的一些要求。LLC 是正常交税的公司, 不需要披露财务信息, 自由度比较高。DAF 介于捐赠工具和金融工具之间, 是一个慈善性质的投资账户。科技精英会“按需成立”不同的捐赠组织, 兴趣相投者会融合成捐赠圈。普通捐赠圈与金智复合体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政治上的一致主张, 捐赠圈就仅仅是一种“兴趣联盟”。而如果发展出意识形态, 捐赠圈就成为融合金钱和观念的网络并能用于推动特定的政治议程。硅谷既有各个科技精英独立运作的金智复合体, 也有基于相似的产业利益 (高科技行业)、地理空间 (西海岸/硅谷) 和认知取向 (黑客文化), 融合形成的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捐赠圈。

**(一) 捐赠机构: 501 (c) (3)、LLC 或 DAF**

501 (c) (3) 形式的基金会是最常见的美国慈善组织类型, 20 世纪完成财富积累的科技精英多数选择这种捐赠工具。微软创始人盖茨、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 和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立特 (William Hewlett) 等都很早就创有私人基金会。基金会是 501 (c) (3) 组织中纯粹用于捐赠和资助, 而不直接运营实务的。贝佐斯、马斯克等科技精英扣除了慈善捐赠产生的税收优惠后, 向政府支付的“真实税率”低于 5%。<sup>①</sup> 税收优惠的原因是 501 (c) (3) 必须为“公共目的”而成立, 理论上, 全社会都有均等的机会从这类组织的活动中获益。501 (c) (3) 也因此受到严格限制, 它必须定期向税务部门提交表格, 资金来源不能匿名, 也必须与政治事务保持距离, 不能介入选举, 也不能将主要资金用于游说。<sup>②</sup> 但是, 501 (c) (3) 有丰富的渠道来从观念层面影响政治, 如资助智库、媒体, 501 (c) (3) 还可以资助 501 (c) (4) 组织, 后者虽同是免税组织, 但有更大的政策倡导和游说自由。这些都成为 501 (c) (3) 影响政治的

---

<sup>①</sup> Jesse Eisinger, Jeff Ernsthansen and Paul Kiel, “The Secret IRS Files: Trove of Never-before-Seen Records Reveal How the Wealthiest Avoid Income Tax”, ProPublica, Jun. 8, 2021,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the-secret-irs-files-trove-of-never-before-seen-records-reveal-how-the-wealthiest-avoid-income-tax>.

<sup>②</sup> 银培菘:《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如何塑造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观念体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86~196页。

□ 当代亚太

“幽径”。<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科技精英放弃税收优惠，选择有限责任公司（LLC）作为慈善捐赠的工具，为的是更少地受到法律约束，从而更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sup>②</sup> LLC 不需要披露捐赠信息，无须像 501（c）（3）一样提交纳税表格，它的资金流向也因此比前者更难追踪。易趣创始人奥米迪亚于 2004 年同时创办了 501（c）（3）基金会和 LLC。扎克伯格夫妇于 2015 年承诺捐出 99% 的脸书股份用于慈善事业，并成立 LLC 形式的 CZI，这一举动被主流媒体称为“为慈善事业贴上了政治肌肉”。<sup>③</sup> 2020 年，推特的合伙人多尔西（Jack Dorsey）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立 LLC 形式的慈善组织“从小开始基金”（Start Small Foundation），并承诺为此出资 10 亿美元。<sup>④</sup>

捐赠者建议基金（DAF）在最近十年的硅谷科技精英中更加流行。首先，DAF 可以接受现金或增值性的金融资产，并为捐赠者立刻带来税收优惠；其次，它可以匿名，捐赠者无须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息；此外，它在支出和活动方面的限制很小，资助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不受限制。目前已经有大量硅谷科技精英及其家族成员成立 DAF，包括扎克伯格、马斯克、易趣公司的合伙人杰弗里·斯科尔（Jeffrey Skoll）等。

捐赠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成立何种捐赠组织。基金会是绝大多数精英的选择，但扎克伯格是一个例外，他的巨额资助是以 LLC 的形式注册的。扎克伯格表示，他的慈善组织 CZI 注册为 LLC 等于放弃税收优惠，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政策倡导与改革。<sup>⑤</sup> 为此，扎克伯格聘请了专业的政治活动家来管理 CZI 的政策倡导工作，如奥巴马 2008 年的总统竞选经理大卫·普

---

① Philip Rojc, “Beyond the (c) (3): Donors Change Tactics, Driving a New Era of Politicized Giving”, *Inside Philanthropy*, Sep. 2019, <https://www.insidephilanthropy.com/home/2019/7/22/beyond-c3-should-we-welcome-a-new-era-of-politicized-giving>.

② Kerry A. Dolan, “Mark Zuckerberg Explains Why the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isn’t a Charitable Foundation”, *Forbes*, Dec. 4, 2015,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rryadolan/2015/12/04/mark-zuckerberg-explains-why-the-chan-zuckerberg-initiative-isnt-a-charitable-foundation/>.

③ Mike Isaac,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Builds Political Muscle for Philanthropic Work”, *New York Times*, Jan. 10, 2017.

④ Mike Isaac, “Jack Dorsey Vows to Donate \$1 Billion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New York Times*, Apr. 23,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7/technology/jack-dorsey-donate-1-billion-coronavirus.html>.

⑤ Natasha Singer and Mike Isaac, “Mark Zuckerberg’s Philanthropy Uses L. L. C. for More Control”, *New York Times*, Dec. 2, 2015.

劳夫 (David Plouffe), 以及管理小布什 2004 年竞选、在 2005 年至 2007 年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肯·梅尔曼 (Ken Mehlman)。<sup>①</sup> 虽然存在盖茨基金会这种坚持以传统的 501 (c) (3) 形式运作的捐赠组织, 但它们的政策参与度也很强。盖茨基金会长期与多边主义机构合作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每年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在全球卫生多边治理机制中获得与多边主义组织相似的地位。<sup>②</sup> 更多科技精英选择转向 LLC 和 DAF, 以更低调的形式实现了金智复合体的权力转化机制。学术界对精英使用 LLC 和 DAF 进行不透明捐赠的问题表示担忧, 引发了关于改革和监管 DAF 的呼声。2020 年, 美国加州第一个通过了监管 DAF 的立法, 但尚未签署生效。<sup>③</sup>

## (二) 捐赠圈: 硅谷社区基金会

科技精英的金智复合体依托于硅谷捐赠圈的形成。如前所述, 由一个精英创立的多个捐赠组织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金智复合体, 但更多的情况下, 不同捐赠者或捐赠机构在一定社会化过程后可形成“捐赠圈”(giving circle), 也就是捐赠者之间汇集资源, 形成共识性捐赠取向的社会网络。安吉拉·艾肯贝里 (Angela M. Eikenberry) 2007 年估计美国约有 200 个捐赠圈。<sup>④</sup> 智库“慈善内幕”(Inside Philanthropy) 认为, 到 2022 年美国的捐赠圈已经达到 2000 个。<sup>⑤</sup> 20 世纪中期, 美国的慈善事业版图从原来以“纽约—

---

① “New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Hires to Build Policy, Advocacy Efforts”, *Candid*, Jan. 12, 2017, <https://philanthropynewsdigest.org/news/new-chan-zuckerberg-initiative-hires-to-build-policy-advocacy-efforts>.

② Chelsea Clinton and Devi Sridhar, “Who Pays for Cooperation in Global Heal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HO, the World Bank,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HIV/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and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ealth Policy*, Vol. 390, No. 16, 2017, pp. 324-332.

③ California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AB-2936 Supervision of Trustees and Fundraisers for Charitable Purposes Act: Donor-Advised Funds”, <https://www.californiansforthearts.org/legislation-news/2020/8/26/ab-2936-supervision-of-trustees-and-fundraisers-for-charitable-purposes-act-donor-advised-funds>.

④ Angela M. Eikenberry, “Philanthropy,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 Giving Circles and Challenges for Democracy”,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 39, No. 7, 2007, pp. 857-882.

⑤ “What is a Giving Circle?”, *Inside Philanthropy*, <https://www.insidephilanthropy.com/explainers/what-is-a-giving-circle>.

□ 当代亚太

东海岸”为中心明显地转向“硅谷—西海岸”。<sup>①</sup> 进入 21 世纪，科技精英以硅谷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捐赠圈，捐赠者之间越来越具有认知共同体的特征。<sup>②</sup>

硅谷捐赠圈的形成以数字革命带动的三次财富积累浪潮为界。第一次浪潮在 20 世纪下半叶展开，以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相关产业的繁荣为起点。成立于 1939 年的惠普公司被视为硅谷的诞生地。<sup>③</sup> 20 世纪 60 年代，惠普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创立了休立特基金会（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这也是加州第一批利用早期科技公司的资金创建的大型基金会。随后，英特尔公司的成功促使盖茨和摩尔等高管于 20 世纪末成立了个人基金会。第二波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初代互联网商业的繁荣驱动。在电子商务领域发迹的易趣公司合伙人奥米迪亚和斯科尔各自创建了 501 (c) (3) 和 LLC 形式的新型慈善事业，开始将资金用于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第三波浪潮发生在 2010 年前后，出现在更多元化的 ICT 产业。这波浪潮的科技精英与前辈不同，他们不等“功成名就”，而是在创业成功后即刻启动慈善事业。扎克伯格在脸书上市后两年就向纽瓦克公立学校系统捐赠了 1 亿美元，在五年内创立了 CZI。<sup>④</sup> 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均是如此。第三波的浪潮中的科技精英也被称为“1%一代”，他们受赛富时（Salesforce）创始人贝尼奥夫的影响，在个人慈善事业外，做出捐献 1% 的股权、1% 的产品和 1% 的员工时间的“1% 承诺”。

硅谷社区基金会（SVCF）成立于 2007 年，是硅谷捐赠圈最典型的组织载体，也是硅谷金智复合体开始形成的标志。社区基金会在税法上是 501 (c) (3) 的子集，名为“公共慈善组织”，免税程度比私营基金会还高。它要求资金必须来源广泛，而不是单一捐赠者。但是，福布斯曾于 2018 年统计，SVCF 的大捐赠者主要以科技精英为主，包括脸书的多名高管、易趣的

---

① Aaron Horvath and Walter W. Powell, “Seeing Like A Philanthropist: From the Business of Benevolence to the Benevolence of Business”, in Aaron Horvath and Walter W. Powell eds.,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81-122.

② Paul Brest, “The Outcomes Movement in Philanthropy and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Aaron Horvath and Walter W. Powell eds.,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81-408.

③ 惠普车库（艾迪生大道 367 号）现在被指定为加州官方历史地标，标有一块牌匾“硅谷诞生地”。

④ Mike Scutari, “What We Learned from a Deep Dive Into Tech Industry Giving”, *Inside Philanthropy*, Jan. 12, 2022, <https://www.insidephilanthropy.com/home/2022/1/12/what-we-learned-from-a-deep-dive-into-tech-industry-giving>.

斯科尔、推特的多尔西 (Jack Dorsey)、网飞 (Netflix) 的里德·黑斯廷斯 (Reed Hastings)、网络信使 (WhatsApp) 的布赖恩·阿克顿 (Brian Acton) 等合伙人、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sup>①</sup> 智库“资本研究中心”通过调查 SVCF 的税务表格发现, 其 2019 年收入的 70% 只来自 11 个捐助者, 2018 年的收入有 75% 来自 10 个捐助者。<sup>②</sup> 也就是说, SVCF 名为“硅谷社区基金会”, 实际上它的旨趣并不囿于“社区”, 而是一个由科技精英主导的捐赠圈。用 SVCF 前任首席执行官埃梅特·卡森 (Emmett Carson) 的话来说, SVCF “无法放在任何一张地图上”, “社区”的地理位置、兴趣和身份不应该成为它的限制。<sup>③</sup>

SVCF 虽然以硅谷为基地, 但其目标却在美国全国和整个世界。科技精英的庞大资金注入使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资产在 2018 年达到了惊人的 135 亿美元,<sup>④</sup> 至今仍是美国最富有的社区基金会。SVCF 还吸纳大量的 DAF 赠款, 致使其资金的来源更不透明。然而, SVCF 的赠款很少用于本地“社区”。2017 年, 硅谷社区基金会的资产同比增长了 64%, 它在本地的慈善捐赠却同比下降了 46%, 并为此承担了巨大舆论压力, 不得不从 2019 年起开始将注意力放回湾区本地。<sup>⑤</sup> 大量研究和媒体报道显示, SVCF 的赠款主要流向了区域外和国际事务。资助了大量有政治性的 501 (c) (3)、501 (c)

---

① Kerry A. Dolan, “Here are 17 Billionaires Who’ve Donated to the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Forbes*, May 2,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rryadolan/2018/05/02/here-are-16-billionaires-who-ve-donated-to-the-silicon-valley-community-foundation/>.

② “2018 Annual Report”, SVCF, Dec. 31, 2018, <https://www.siliconvalleycf.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inancial/svcf-audit-report-2019.pdf>.

③ Alan M. Cantor, “Growth or Mission? The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Made the Wrong Choice”, *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May 18, 2018, [https://www.philanthropy.com/article/growth-or-mission-the-silicon-valley-community-foundation-made-the-wrong-choice/?cid=gen\\_sign\\_in](https://www.philanthropy.com/article/growth-or-mission-the-silicon-valley-community-foundation-made-the-wrong-choice/?cid=gen_sign_in).

④ Kerry A. Dolan, “Mark Zuckerberg Explains Why the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Isn’t a Charitable Foundation”, *Forbes*, Dec. 4, 2015,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rryadolan/2015/12/04/mark-zuckerberg-explains-why-the-chan-zuckerberg-initiative-isnt-a-charitable-foundation/>.

⑤ “Shifting Our Grantmaking Strategies: An Update on Our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SVCF, Jul 8, 2020, <https://www.siliconvalleycf.org/blog/grantmaking/shifting-our-grantmaking-strategies-update-our-strategic-planning-process>.



□ 当代亚太

(4) 组织，其中大部分与民主党有关。<sup>①</sup>

(三) 意识形态：自由世界主义

如图 2 所示，硅谷科技精英的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由世界主义”，具体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在国内政策上赞同自由多元主义，相对亲近民主党；在国际政策上推崇世界主义，反对孤立主义。这是一种混合了理想层面的黑客文化（世界主义）和现实层面的党派议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科技精英追求以黑客精神为内核的“人类一体”概念，也不得不美国两极分化的混沌政治现实中“选边站”。

在现实层面，科技精英推崇自由主义。比起共和党代表的“消极自由主义”，科技精英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代表的“积极自由主义”。共和党维护白人选民和主流利益，而民主党在教育、移民、性少数群体（LGBTQ+）权利、种族平等议题上更支持少数群体的利益。硅谷企业以高素质移民为主体，科技精英显然倾向后者。在国际政治中，科技精英对全球健康和发展、气候变化、太空与极地探索等议题有浓厚兴趣，这不仅与共和党背道而驰，甚至比民主党还要“先锋”。最后，科技精英在认知取向上笃信科学理性和世俗主义，也与重视传统伦理和宗教信仰的共和党格格不入。

在理想层面，科技精英推崇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来自希腊语（kosmopolitēs）。在思想史上，东西方对世界主义的解读各有不同，共性是认为全人类都属于一个共同体，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sup>②</sup> 黑客文化与世界主义有诸多共通之处。互联网的发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接近于一种虚拟的世界主义——黑客打破了主权国家设置的种种“防火墙”，数据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公开并且可追溯。黑客可以将资源与全世界共享，并将系统的弊端公之于世。正如脸书前总裁肖恩指出，黑客的价值观是“反体

---

<sup>①</sup> Hayden Ludwig, “Local Philanthropy Isn’t Local for ‘Citizens of the World’”, *Philanthropy Daily*, Aug 16, 2021, <https://www.philanthropydaily.com/local-philanthropy-isnt-local-for-citizens-of-the-world-2/>; Mike Scutari, “Silicon Valley Fortunes Grow, but Frustrating Trends in the Region’s Philanthropy Persist”, *Inside Philanthropy*, Sep. 28, 2021, <https://www.insidephilanthropy.com/home/2021/9/28/silicon-valley-fortunes-grow-but-frustrating-trends-in-the-regions-philanthropy-persist>.

<sup>②</sup> 蔡拓：《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第9～24页；任晓：《论中国的世界主义——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第30～45页。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

制、对系统漏洞很敏感、对数据有宗教式的信仰、用优雅的技术和社会解决方案破解复杂问题”。当黑客晋升为社会精英，并渴望承担社会责任时，往往表现得比较乌托邦主义。<sup>①</sup> 例如，扎克伯格在宣布成立 CZI、捐赠几乎所有个人股票时，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在 21 世纪末治愈人类所有疾病，让人均寿命达到百岁。长期管理硅谷慈善的专业人士对此的解释是：“对于这些捐赠者来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黑客）正在改变世界，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捐赠也应该改变世界。”<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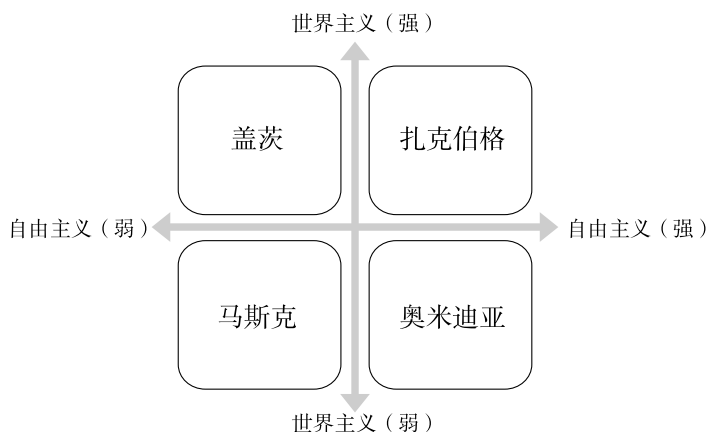


图 2 代表性科技精英的“自由世界主义”思想谱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程度的强弱，图 2 展示了科技精英四种基本类型的思想及其典型代表。在两个维度下，科技精英群体内的“自由世界主义”主张有程度上的差别。第一种“强自由主义—强世界主义”的代表是扎克伯格，他也是本文案例研究的对象。扎克伯格长期为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等民主党政客提供支持，担任民主党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的顾问，也支持与民主党观点接近的共和党人马尔科·卢

① Sean Parker, “Sean Parker: Philanthropy for Hackers”.

② 受访人瑞克·威廉姆斯 (Rick Williams) 在慈善和社会服务领域工作了 20 年，目前是硅谷的索布拉脱基金会 (Sobrato Family Foundation) 的总经理。参见 Justin Torres and Karl Zinsmeister, “The Calculating Philanthropy of Silicon Valley”, Philanthropy Roundtable, 2018, p. 26, <https://www.philanthropyroundtable.org/magazine/the-calculating-philanthropy-of-silicon-valley/>.

□ 当代亚太

比奥 (Marco Rubio)。<sup>①</sup> 此外, 扎克伯格世界主义的意识很强, 很早就提出过希望建立一个虚拟的全球共同体, 用知识和技术来解决未来世界的治理问题。第二种“强自由主义—弱世界主义”的代表是阿米迪亚。阿米迪亚在国内政治上非常左翼, 是科技精英中最坚定的特朗普反对者。他从 2016 年开始为“反特朗普”运动积极奔走, 除了资助反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 其个人慈善组织“民主基金”为反特朗普的 501 (c) (3)、501 (c) (4) 大量组织筹款。<sup>②</sup> 相比之下, 阿米迪亚参与全球性事务的积极性较弱, 远不及盖茨和扎克伯格。盖茨是第三种“弱自由主义—强世界主义”的代表。盖茨基金会对于全球卫生治理的贡献不仅得到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等官方部门的肯定, 也在学术文献中被广泛探讨。<sup>③</sup> 然而, 盖茨与私营部门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他偏向保守主义的一面——他反对在新冠疫情下削弱疫苗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 并且与美国制药公司有深度的利益关联。<sup>④</sup> 马斯克是第四种“弱自由主义—弱世界主义”的代表。内政问题上, 马斯克很少卷入美国国内的党派竞争, 偶尔会嘲笑民主党左翼政客针对富人的税收政策。<sup>⑤</sup> 在国际政策上, 马斯克的“真情实感”不多, 他对气候变化的慈善承诺与特斯拉的业务有关, 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战略的背后有强烈商业动机, 甚

---

① Tyler Pager and Kurt Wagner,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Privately Advised Pete Buttigieg on Campaign Hires”, *Time*, October 21, 2019, <https://time.com/5705995/zuckerberg-buttigieg/>; “Donor Lookup: Mark Zuckerberg”, *Open Secrets*, <https://www.opensecrets.org/donor-lookup/results?name=mark+zuckerberg>.

② “Return of a Private Foundation (Form 990-PF)”, *Democracy Fund*, 2016, Part VIII Line 1, <https://democracyfun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2016-DF-Form-990-PF.pdf>.

③ Talha Burki, “Fresh Questions Over Gates Foundation Governance”, *The Lancet*, Vol. 399, No. 10324, 2022, p. 508; Roosa Lambin and Rebecca Surender, “The Rise of Big Philanthropy in Global Socia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Transfer and 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 1, No. 18, 2021, pp. 1-18.

④ Tim Schwab, “Covid-19, Trust, and Welcome: How Charity’s Pharma Investments Overlap with Its Research Effort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Online)*, Vol. 372, 2021, <https://www.bmj.com/content/372/bmj.n556>.

⑤ Joseph Zeballos-Roig and Juliana Kaplan, “Elon Musk Keeps Picking Twitter Fights with Democrats Who Want to Slash the Wealth Amassed by the Top 1%”, *Insider*, Nov. 17, 202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elon-musk-sanders-wyden-twitter-fights-democrats-wealth-tax-billionaires-2021-11>.

至还与贝索斯的公司激烈竞标。<sup>①</sup> 深受“Z世代”崇拜的马斯克虽有“反建制”的标签，但实际上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挑战性是最弱的。

综上所述，科技精英的政治影响机制，是以结构性权力为依托，一方面可以通过精英直接控制的捐赠机构形成独立的金智复合体，另一方面也可融入更大的金智复合体，综合多种渠道对资金进行分流和匹配。自由世界主义是硅谷金智复合体总体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侧重在国内政治中支持左翼政党和议题，“世界主义”侧重在国际政治中支持多边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根据这两个维度上的细微差别，自由世界主义存在四种基本类型，分别以扎克伯格、阿米迪亚、盖茨和马斯克为典型代表。

## 五、践行“自由世界主义”——以扎克伯格为例

为什么选择扎克伯格作为科技精英的研究案例？第一个原因是理论性的，在四种基本的自由世界主义类型中，扎克伯格是“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双强，可以最全面地展示自由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个原因是现实性的，扎克伯格遭遇美国政府的审查最多，他试图突破限制性结构的动力也最强。近年来，虽然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都面临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但只有脸书公司第一个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式起诉。确定扎克伯格作为案例后，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他与“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6个国内和国际行动作为子案例，追踪了“跨结构转化”与“金智复合体”这两种机制在其中的应用。

### （一）国内议程：自由主义

在自由主义议程方面，扎克伯格有明确的温和左翼立场，即支持自由主义，但拒绝左翼民粹主义。<sup>②</sup> 2020年1月31日，扎克伯格在硅谷技术峰会的演讲中说，他的政治立场是支持绝对的“表达自由”。<sup>③</sup> 扎克伯格和硅谷其

<sup>①</sup> Bryan Bender, “Sanders Looks to Shoot Down Bezos’ Moon Plans”, Politico, Mar. 31,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3/31/bernie-sanders-jeff-bezos-moon-plans-00022035>.

<sup>②</sup> 硅谷支持民主党，但明确反对桑德斯等左翼民主党候选人。参见 Nellie Bowles and Erin Griffith, “Silicon Valley Leaders’ Plea to Democrats: Anyone but Sanders”, *New York Times*, Mar. 3, 2020.

<sup>③</sup> Sheera Frenkel and Cecilia Kang, *An Ugly Truth: Inside Facebook’s Battle for Domination*, New York: Harper, 2021, p. 275.

□ 当代亚太

他科技精英一样，支持与开放、透明和全球化等价值观有关的政策。<sup>①</sup> 尽管从2012年到2022年，脸书政治行动委员会（Facebook PAC）对共和党的捐赠高于民主党<sup>②</sup>，但扎克伯格通过运作自己和硅谷捐赠圈的金智复合体支持的是民主党。他用慈善资金助推了拜登2020年总统选举的胜利，被保守派称为“扎克现金”。在司法、教育、移民、种族等领域，扎克伯格与其他科技精英合作，倡导一揽子的左翼政治议程。

1. “扎克现金”

“扎克现金”（Zuck bucks）的背景是，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自由主义（左翼）和保守主义（右翼）动员选民的策略不同——通常情况下，投票率越高对左翼越有利，反之则对右翼越有利。因此，左翼的资助者会致力于增加投票率和投票便利性，而右翼的资助者则会以“选民诚信度”为名，尽力筛选掉一部分“不诚实”的选民，变相地阻止了一部分群体（通常是擅长草根动员的左翼团体）登记和投票。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已被多次使用，萨沙·伊森伯格（Sasha Issenberg）的研究发现，卡内基基金会通过资助与“数据分析”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功提高了政治冷漠的选区的投票率，使他们成为民主党的票仓。<sup>③</sup>

“扎克现金”具体指的是，扎克伯格在2020年美国选举中结合自己的CZI与硅谷捐赠圈来提高投票率、增加民主党优势的做法。扎克伯格选择了他最擅长的技术领域，在新冠疫情使现场投票受阻的情况下，结合互联网改善选举基础设施和投票条件。两个关键的非营利组织“技术与公民生活中心”（CTCL）和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CEIR）承担了扎克现金运动中的中介功能。一方面，扎克伯格的CZI于2020年9月拨款2.5亿美元给CTCL，拨款5000万美元给CEIR。<sup>④</sup> CTCL是一个以技术见长的组织，与脸书与谷

---

① Nathan Hitchen, “Digital Libertarians and the Problem of Cyber Statecraft”,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Feb. 23, 2022,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toward-cyber-statecraft-the-danger-of-digital-libertarianism/>.

② “PAC Profile: Facebook Inc”, *Open Secrets*, <https://www.opensecrets.org/political-action-committees-pacs//C00502906/summary/2012>.

③ Sasha Issenberg, *The Victory Lab: The Secret Science of Winning Campaigns*, New York: Crown, 2012, pp. 153-160.

④ Press Release, “Mark Zuckerberg and Priscilla Chan Commit \$300 Million to pPromote Safe and Reliable Voting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CTCL and CEIR, Sep. 1, 2020,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7070695-CTCL-CEIR-Press-Release-9-1-20-FINAL>.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

歌等互联网公司合作，帮助选民参与线上选举，并为候选人提供线上竞选的技术培训；CEIR 是一个选举政策倡导团体，以研究和二级赠款来提高投票率。另一方面，扎克伯格还通过硅谷捐赠圈来增强对两个组织的支持。扎克伯格是 SVCF 长期以来最大的个人捐赠者，而 SVCF 在 2020 年向 CTCL 捐赠了 3.28 亿美元，向 CEIR 捐赠了 6900 万美元，分别是该基金会当年第二大和第三大拨款。<sup>①</sup>

“扎克现金”在 2020 年大选中所发挥的拐点性作用已被广泛讨论。<sup>②</sup> 首先，新冠疫情期间的资金加技术手段大幅度提高了远程投票率，大大有助于民主党。CTCL 和 CEIR 在疫情期间不仅提供线上投票技术支持，也为邮寄选票提供补贴。在 2020 年大选中，1 亿多人通过邮寄进行早期投票，对拜登的胜选至关重要。<sup>③</sup> 其次，资金的规模足以与财政支出匹敌。美国政府 2020 年 3 月为支持新冠疫情期间选举出台的《CARES 法案》拨款 4 亿美元。<sup>④</sup> 而扎克伯格仅仅从自己的捐赠机构 CZI 就为 CTCL 和 CEIR 支出了 3.5 亿美元，加上扎克伯格捐赠给 SVCF 并被用于这两个组织的 4 亿美元，已经实际上超过了《CARES 法案》的财政拨款。最后，部分研究认为，“扎克现金”在地方层面对选举基础设施的支持中具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向支持拜登的州县提供更大的赠款和更多的人均资金。这种倾向在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尤其突出。<sup>⑤</sup>

---

① Hayden Ludwig, “More of Zuckerberg’s Election Fund”, *Capital Research*, Dec. 20, 2021, <https://capitalresearch.org/article/more-of-zuckerbergs-election-fund/>.

② The Editorial Board, “Zuckerbucks Shouldn’t Pay for Elec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3,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zuckerbucks-shouldnt-pay-for-elections-mark-zuckerberg-center-for-technology-and-civic-life-trump-biden-2020-11640912907>.

③ Sam Gringlas, “Pennsylvania Supreme Court Extends Vote by Mail Deadline, Allows Drop Boxes”, *NPR*, Sep. 17,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9/17/pennsylvania-mail-ballot-deadline-extended-417044>.

④ 2020 年 3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该法案包括 4 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供各州用于预防、准备和应对 2020 年联邦选举周期的新冠疫情。参见“2020 CARES Act Grants”，U. S.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 Mar. 27, 2020, <https://www.eac.gov/payments-and-grants/2020-cares-act-grants>.

⑤ Parker Thayer and Hayden Ludwig, “UPDATED: Shining a Light on Zuck Bucks in the 2020 Battleground States”,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Jan. 18, 2022, <https://capitalresearch.org/article/shining-a-light-on-zuck-bucks-in-key-states/>.



□ 当代亚太

2. 左翼议题

扎克伯格也与盖茨、奥米迪亚等科技精英合作，在教育、移民、种族正义、司法、新冠疫情等内政事务上明确地支持自由主义立场，涵盖一揽子左翼政治议程。扎克伯格为教育改革投入的财力和效果已被学术界承认。2013年，扎克伯格与盖茨和领英（LinkedIn）合伙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等科技精英合作设立非营利组织“FWD.us”，公开倡导移民政策。2014年，FWD.us发起大规模的移民改革运动，也为主张全面移民改革的参议员卢比奥、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人提供支持。CZI向移民类倡导组织“国家移民论坛”“移民法律资源中心”和“美国移民委员会”提供2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的资助。<sup>①</sup>从2016年起，扎克伯格通过CZI为改革刑事司法体系、减轻监狱刑罚投入数百万美元。<sup>②</sup>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CZI从2021年6月拨款了1.1亿美元用于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事业恢复，其中以少数族裔的疫苗接种和教育作为重点方向。<sup>③</sup>

（二）国际议程：世界主义

2017年，扎克伯格的一篇“全球社区”宣言表达了世界主义的思想：“社区的治理应该随着居民的复杂性和需求进行扩展……如建立一个全球投票系统，赋予人们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权。”<sup>④</sup>扎克伯格的“元连接”（Meta Connectivity）计划、“天秤币”（libra）计划，以及卫生治理和气候变化议程，都展示了他通过跨结构转化或金智复合体来推进世界主义价值观的行动。

1. 元连接

扎克伯格拓展全球网络空间的“元连接”计划，是他动用自己的商业资

---

① Alec Torres, “Where are Mark Zuckerberg’s Billions Going?”,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Feb. 17, 2016, <https://capitalresearch.org/article/where-are-mark-zuckerbergs-billions-going/>.

② Alex Thompson and Noah Kulwin, “Exclusive: Zuckerberg Group to Spend \$45 Million on Political Causes”, Vice, Oct. 25, 2017,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8xmvgv/mark-zuckerberg-political-spending>.

③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Announces \$15 Million COVID-19 Response Portfolio for Vaccine Equity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Efforts”, CZI, Jun 24, 2021, <https://chanzuckerberg.com/newsroom/czi-commits-15-million-for-vaccine-equity-healthcare-communications-czi-newsroom/>.

④ Adrienne LaFrance, “The Largest Autocracy on Earth”, The Atlantic, Nov. Issue,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1/11/facebook-authoritarian-hostile-foreign-power/620168/>.

源和在全球性生产结构中的权力推进世界主义议程的案例。元连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全世界的互联网覆盖率，打造真正“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社区。人人能上网是元宇宙图景落地的现实基础，但是第三世界还有广阔地区没有连入互联网。元连接战略可以追溯到 2013 年，扎克伯格提出将在五到十年内实现“人人能上网”的目标。随后十年中，他广泛地与电信公司、设备制造商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合作，加入电信基础设施项目（TIP）、无线联盟（Wi-Fi Alliance），并在特定国家和国际上开展相关倡导等。<sup>①</sup>

在元连接战略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是将互联网人权化的“Internet.org”和从地缘上拓展互联网边界的“2Africa”。

Internet.org（又名 Free Basics）是一个政治化的网络援助项目。2013 年，元宇宙与三星、爱立信、诺基亚、高通等六家公司合作，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互联网资源。<sup>②</sup> 扎克伯格为该项目撰写了十页的白皮书来阐述“上网是人权”的思想：“数据像食物和水一样，是一项基本人权……人人能上网的世界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脸书公司这样的机构来推动。”<sup>③</sup> 在 2014 年的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扎克伯格再次将上网与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在赞比亚，妇女民权非营利组织使用 Internet.org 的一个专门的应用程序来帮助妇女了解她们的合法权利。”Internet.org 在产生全球影响的同时，它内含的意识形态也引发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察觉和抵制。Internet.org 进入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 1 亿人提供了互联网资源。<sup>④</sup> 但是，Internet.org 只是对一部分内容免费，超出这个范围的访问需要收费，而有限的访问范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议。2017 年，非政府组织“全球之声”发布报告称，Internet.org 提供的免费内容“亲西方企业”，是违反网络

---

① Fabrice Quandji, “Investment in Shared Infrastructure for Closing the Digital Divide”, Meta Connectivity, Nov. 15, 2021, [https://www.facebook.com/connectivity/news/africom\\_2021](https://www.facebook.com/connectivity/news/africom_2021).

② “Update to Internet.org Free Basic Services”, Meta, Sep. 24, 2015, <https://about.fb.com/news/2015/09/update-to-internet-org-free-basic-services/>.

③ Jessi Hampel, “What Happened to Facebook’s Grand Plan to Wire the World?”, Wire, May 17, 2018, <https://www.wired.com/story/what-happened-to-facebooks-grand-plan-to-wire-the-world/>.

④ “A Note from Mark Zuckerberg”, Meta, Mar. 14, 2019, <https://about.fb.com/news/2022/06/mark-zuckerberg-note/>.

□ 当代亚太

中立性的“数字殖民主义”。<sup>①</sup>

印度对 Internet.org 的拒绝充分体现了“数字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印度是 Internet.org 推进的重点国家。2014 年 5 月，莫迪赢得印度总统选举，脸书在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 月，首届 Internet.org 峰会在新德里召开，扎克伯格与莫迪也在峰会上达成了推进 Internet.org 的共识。然而，Internet.org 正式进入印度后，被质疑违反“网络中立性”。2015 年 3 月，印度电信监管局正式对 Internet.org 进行调查。2016 年，印度宣布支持“网络中立性”，将 Internet.org 定性为非法。<sup>②</sup> 退出印度对 Internet.org 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其官方网站在大约一年内没有任何更新。几乎同时，Internet.org 退出了缅甸、玻利维亚、刚果共和国等十几个国家。<sup>③</sup> 在印度遭遇滑铁卢后，Internet.org 尽管没有正式关闭，但被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少，官方信息也近乎没有更新。2019 年的元宇宙管理层人事变动甚至使媒体猜测这一项目已经悄然流产。<sup>④</sup>

另一个关键项目 2Africa 开始于 2020 年 5 月，这是一个环绕非洲大陆并连接欧洲和中东的海底电缆建设项目。<sup>⑤</sup> 2Africa 由 8 家公司共同出资，原定总长度 3.7 万公里，2023~2024 年投入使用。<sup>⑥</sup> 中国移动国际（CMI）也是主要的合作者。2021 年 9 月，元宇宙宣布为 2Africa 新增“珍珠”分支（2Africa PEARLS），将覆盖范围扩展至塞舌尔、科摩罗群岛、安哥拉和尼

---

① Olivia Solon, “It’s Digital Colonialism: How Facebook’s Free Internet Service has Failed Its Users”, *The Guardian*, Jul. 27, 2017; Advox, “Can Facebook Connect the Next Billion?”, *Global Voice*, Jul. 27, 2017,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7/07/27/can-facebook-connect-the-next-billion/>.

② Rahul Bhatia, “The Inside Story of Facebook’s Biggest Setback”, *The Guardian*, May 12, 2016.

③ Manish Singh, “After Harsh Criticism, Facebook Quietly Pulls Servic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Outline*, May 1, 2018, <https://theoutline.com/post/4383/facebook-quietly-ended-free-basics-in-myanmar-and-other-countries>.

④ Molly Mchugh, “Does Facebook’s Executive Shake-up Signal the End of Internet.org?”, *The Ringer*, Mar. 19, 2019, <https://www.theringer.com/tech/2019/3/19/18272185/internet-org-facebook-mark-zuckerberg-chris-daniels-net-neutrality>.

⑤ “Deploying the Largest Subsea Fiber-optic Cable System Ever”, 2Africa, <https://www.2africa.cable.net/>

⑥ Sebastian Moss, “Facebook and telco partners expand 2Africa cable system”, *Data Center Dynamics*, Aug. 17, 2021, <https://yinksmedia.com/2africa-subsea-cable-system-set-to-connect-3-billion-with-first-landing-in-italy/>.

日利亚东南部。目前，2Africa 的铺设长度已超过 4.5 万公里，是迄今为止全球最长的海缆项目。<sup>①</sup> 在 8 个合作伙伴中，元宇宙公司是该项目唯一一个来自区域外（美国）、不主营电信业务的合作伙伴。无论元宇宙公司的投资动机是否包含了地缘政治，它积累的资源 and 经验都会对欧、亚、非地区未来的网络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 2. 天秤币

技术是科技精英将知识结构性权力转化为金融结构性权力的突破口。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流派中不乏货币的“去国家化”方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各国的货币供应量不再取决于国家黄金存储量，而是取决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强调稳定货币的重要性，提出单一货币原则。哈耶克（F. A. Hayek）提出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应该由私人发行货币，通过竞争形成市场内生的货币体系。<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以密码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创造史上充满了“失败者的尝试”。从 eCash 到曾经辉煌一时的 E-gold，再到 B-money 以及 Bitgold，20 世纪探索数字货币的尝试最终都功亏一篑，但是这个过程促进了密码学技术的迭代升级，为后续数字货币发展打下了基础。<sup>③</sup>

尝试打破技术与金融之间壁垒的科技精英之一是迪伊·哈克（Dee Hock），他提出了著名的“混序”思想，与我们讨论的世界主义十分相似。哈克认为，传统企业严格的等级观念、规章制度和控制扼杀了企业的创造性。他想打破“命令—控制”的组织模式，借助生物学的观念设计一种新型组织，使其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哈克将这种组织定义为“混序组织”（chaordic organization），也就是将“混乱”（chaos）和“有序”（order）结合。基于其“混序”思想，哈克成立了 VISA，打破了世界各国信用卡种类繁多、互不兼容的局面，最大限度地连接和共享资源，创造一个“连接器”式的组织结构。<sup>④</sup> VISA 的早期设想本质上就是用技术来突破传统

① 2Africa, “About 2Africa: A Few Figures”, <https://www.2africacable.net/about>.

② 理查德·M. 埃贝林：《货币、银行与国家》，马俊杰译，海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2～204 页。

③ 王腾鹤等编：《一本书读懂数字货币》，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8～45 页。

④ 齐振宏：《VISA International：混序组织的机理与特征研究》，载《科技管理研究》2006 年第 7 期，第 220～222 页。

□ 当代亚太

金融结构的限制。虽然 VISA 变成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是最初树立的宏大愿景并没有实现，仅仅在原有金融机构之上实现了跨国联盟。<sup>①</sup>

哈克的“未竟事业”在 Web 3.0 技术的进步下有了实现的希望。Web 3.0 指的是基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第三代互联网模型，任何人可以创建资源，并将其放在“区块链”上，由集体而非任何一个中间机构托管。区块链使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务（DeFi）变得可能，没有跨国银行账户的用户也可以选择使用数字货币来进行结算。DeFi 约等于是“影子金融市场”，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削弱了传统金融机构和主权国家的权力。<sup>②</sup> 2008 年爆发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的主权信用一度跌到谷底。在此背景下，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也在多年积累后实现了重大突破。2009 年，比特币（bitcoin）使用区块链技术成功解决了早期探索阶段数字货币存在的几个致命技术问题。2015 年更是数字货币的高光时刻，多个重要技术及应用都在这一年产生，包括 IPFS（星际文件系统）、闪电网络、石墨烯技术等。

扎克伯格于 2019 年推出“天秤币”（libra），这是数字货币从“匿名币”到“稳定币”的一次重要尝试。匿名币就是在交易过程中隐藏交易金额、隐藏发送方与接收方的一种数字货币；而稳定币则是可以用来和特定的指数资产保持固定比例兑换的数字货币，具有价值恒定、不会暴涨暴跌的特性，更加适合作为区块链世界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纽带。众所周知的比特币是匿名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匿名币”价格波动过大，难以履行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格尺度职能。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价格相对稳定的“稳定币”的市场份额逐步扩大。<sup>③</sup> 天秤币的出现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扎克伯格原计划于 2020 年发行天秤币，这是他从知识结构跨向金融结构的一大步。为了扫除障碍，扎克伯格没有对天秤币进行独家经营，而是采用类似多边主义机构的多中心化治理模式，将天秤币决策权交给由 28 个协会成员组成的协会，脸书公司在其中并没有特殊地位。

然而，历经三年的谈判、游说和妥协，天秤币最终在美国政府的阻挠下失败。原本天秤币是与多个国家的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数字货币，在美国政府

① 数字资产研究院：《Libra：一种金融创新实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2019 年版，第 310 页。

② Kellie Mejdrieh, “Crypto-based ‘Shadow Financial Market’ Spooks Regulators”, Politico, Jul. 24,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7/24/shadow-financial-market-spoons-regulators-500696>

③ 王腾鹤等编：《一本书读懂数字货币》，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0~122 页。

的压力下于 2020 年 12 月更名为“Diem”货币，变为只与美元挂钩，并妥协为交给美联储监管的银门银行（Silvergate Bank）发行。可是美联储和财政部以担心造成垄断为由，最终拒绝元宇宙公司发行 Diem 货币。2022 年 1 月，元宇宙公司将货币知识产权和资产打包出售给了 Silvergate 银行，并在退出声明中强调了美国政府的“作用”：“从我们与联邦监管机构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项目没法继续推进下去了。”<sup>①</sup>

天秤币对美元存在两个维度的效应：从国际结算维度而言，天秤币与美元是竞争关系；从储备资产维度而言，天秤币和美元则互相支持。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天秤币“是以硅谷为聚集地的科技企业第一次以群体的形式染指华尔街的金融权力，在金融和科技之间体现了科技渐强之势”。<sup>②</sup> 天秤币被扼杀在襁褓中，体现了金融结构中国家力量的顽固。但天秤币的失败并不是故事的终点，马斯克也多次公开表示对数字货币的兴趣，未来科技精英对金融结构会发起怎样的挑战仍然有待观察。

### 3. 卫生治理

众所周知，盖茨基金会在疫苗和传染性疾病预防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为硅谷科技精英的扎克伯格夫妇近年来在生物医学和疾病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扎克伯格妻子是一名职业医生，二人在 2015 年创办 CZI 时就立下宏愿，要在一百年内治愈所有人类疾病。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认为，如果 CZI 将资金用于全球卫生，可能将进一步改变全球卫生治理资金的格局。<sup>③</sup>

扎克伯格夫妇在 CZI 框架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金智复合体。2016 年，扎克伯格夫妇宣布将在未来十年为疾病研究投入 30 亿美元，并首先用 6 亿美元创建跨学科研究中心“Biohub”（Chan Zuckerberg Biohub）。这个中心围绕“研究、技术、投资”三个模块展开，具有典型的金智复合体特征。Biohub 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四大人类疾病类型：心脏病、癌症、传染病和神经

① Sam Sutton and Victoria Guida, “Facebook’s Crypto Project Sold after Political Backlash”, Politico, Jan. 31,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1/31/diem-facebook-cryptocurrency-meta-00003871>.

② 王腾鹤等编：《一本书读懂数字货币》，第 150 页。

③ *Financing Global Health 2014: Shifts in Funding as the MDG Era Closes*,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2015, p. 19, <https://www.healthdata.org/policy-report/financing-global-health-2014-shifts-funding-mdg-era-closes>.



□ 当代亚太

系统疾病，以 CZI 的资金为动力，它汇集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伯克利分校和 CZI 内部的专家，融合了生物、工程与计算机等学科视角。<sup>①</sup> Biohub 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人类细胞图谱和传染病倡议”，它将绘制出健康人体中的所有细胞，在此基础上探索制药、诊断和疫苗的新方法。<sup>②</sup> 在 2021 年年底发布的十年间科学发展规划中，扎克伯格的卫生金智复合体提出了更远的目标，包括创建新的科学研究所，以应对成像、人工智能、传染病研究、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重大科学挑战。除了 Biohub 和计划中的其他自营科研机构以外，扎克伯格的卫生金智复合体也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例如，CZI 于 2017 年资助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领导的新的全球健康倡议（Resolve to Save Lives）。

得益于卫生金智复合体，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成为硅谷第一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回应的公司。2020 年 1 月中旬，弗里登和 Biohub 的副主席乔·德里西（Joe Derisi）向扎克伯格汇报，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球十几个国家。得到消息后，扎克伯格迅速将工作重心从美国选举转移到建立一个新冠疫情信息中心，汇集美国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与此同时，脸书也快速推出事实核查工具，纠正关于新冠疫情的假信息与阴谋论。<sup>③</sup> 当世界卫生组织在 1 月 30 日将新冠疫情定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脸书已经准备好了公关博文。2020 年 3 月，CZI 与盖茨基金会等机构合作，拨款 2500 万美元给“新冠治疗加速器”项目（COVID-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这个项目协调了学术界、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的力量，以开发和评估新冠病毒的药物与疗法，与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助者，以及全球监管和政策制定机构展开广泛合作。<sup>④</sup>

---

① “Suppor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o Cure, Prevent, or Manage All Diseases in Our Children’s Lifetime”, CZI, Sep. 21, 2016, <https://chanzuckerberg.com/newsroom/supporting-scientific-research-to-cure-prevent-or-manage-all-diseases-in-our-childrens-lifetime/>.

②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Announces 10-Year Effort to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to Measure Human Biology in Action”, CZI, Dec. 7, 2021, <https://chanzuckerberg.com/newsroom/chan-zuckerberg-initiative-announces-10-year-effort-to-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ies-to-measure-human-biology-in-action/>.

③ Sheera Frenkel and Cecilia Kang, *An Ugly Truth*, pp. 276-278.

④ “CZI Commits \$25 Million to Speed Development of COVID-19 Treatments”, CZI, Mar. 27, 2020, <https://chanzuckerberg.com/newsroom/czi-commits-25-million-speed-development-covid-19-treatments/>.

此外，扎克伯格还推动人工智能、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在新冠疫情中的应用。早在2018年，扎克伯格的卫生金智复合体就与盖茨基金会合作，支持一种名叫“IDseq”的新技术的发展。<sup>①</sup> IDseq是一种基于云的开源宏基因组学管道和服务，可以用于全球病原体的检测和监测。<sup>②</sup>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柬埔寨的研究人员用该技术在短短几天内就确认了国内首例新冠病例。扎克伯格将IDseq项目更名为“Chan Zuckerberg ID”（简称CZ ID），将它升级为面向研究人员的免费云端宏基因组平台，使全球任何地方的科学家都可以看到冠状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并分享上传新的信息。扎克伯格团队参与的类似工作还有很多。2020年3月，CZI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合作，创立一个结合机器学习技术的新冠病毒研究数据库。美国政府首席技术官克拉奇奥斯（Michael Kratsios）将该数据集描述为“人工智能社区的响应行动”。CZI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全球机器学习社区”，以从根源上破解新冠病毒的谜团。<sup>③</sup>

#### 4. 气候变化

扎克伯格早期一度被列为“美国顶级的气候反派”之一，原因是他对脸上大量气候变化假新闻和亲化石燃料的信息应对不力。<sup>④</sup> 对化石燃料的“姑息”在美国慈善基金会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一项专业研究发现，从2011年至2015年，美国主要基金会为气候变化投入资金中只有12%用于限制化石燃料的开发和生产。<sup>⑤</sup> 2021年4月，扎克伯格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

---

① Ed Young, “A Simpler Way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Mysterious Illnesses in Poor Countries”, *The Atlantic*, Oct. 16,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8/10/dashboard-disease-detectives/573034/>.

② Katrina L. Kalantar *et al.*, “IDseq-An Open Source Cloud-Based Pipeline and Analysis Service for Metagenomic Pathogen Detection and Monitoring”, *Gigascience*, Vol. 9, No. 10, 2020, pp. 1-14.

③ Taylor Hatmaker, “With launch of COVID-19 Data Hub, the White House Issues a ‘Call to Action’ for AI Researchers”, *Tech Crunch*, Mar. 17, 2020, <https://techcrunch.com/2020/03/16/coronavirus-machine-learning-cord-19-chan-zuckerberg-ostp/>.

④ 2020上半年，脸上鼓吹“气候变化是骗局”的广告在美国被浏览了至少800万次，亲化石燃料的广告被浏览了4.31亿次。参见 Georgia Wright, Liat Olenick and Amy Westervelt, “The Dirty Dozen: Meet America’s Top Climate Villains”, *The Guardian*, Oct. 27,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oct/27/climate-crisis-villains-americas-dirty-dozen>.

⑤ Matthew C. Nisbet, “Strategic Philanthropy in The Post-Cap-And-Trade Years: Reviewing US Climate and Energy Foundation Funding”,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Vol. 9, No. 4, 2018, e524.

□ 当代亚太

气候假新闻是“一个大问题”，并加强了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力度。

早在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扎克伯格就宣布加入了盖茨成立的“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私募基金，旨在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清洁”能源，在 2050 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突破能源联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独立金智复合体，参与者有投资人、慈善家、企业和政治家，参与的实体包括投资基金、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突破性能能源联盟的项目一部分以资金为导向，如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成立 1 亿欧元的试点基金，帮助欧洲经济去碳化；另一部分以知识和观念为导向，如设立“突破性能能源研究员”，每年资助一批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开发新的能源技术方案。<sup>①</sup>

近期，扎克伯格开始筹建以 CZI 为核心的气候金智复合体。2021 年 10 月，扎克伯格通过 CZI 为气候变化提供 3300 万美元的资金。其中，1000 万美元将继续用于资助联盟的“突破性能能源研究员”。<sup>②</sup> 其余资金完全由 CZI 主导，分三个方向使用。第一个方向是知识技术。CZI 资助了三个为期两年的奖学金项目，以及评估长期二氧化碳去除（CDR）方法的有效性的研究项目。第二方向是环境正义。CZI 资助了减碳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研究环境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原因。第三个方向是政策倡导。CZI 资助智库“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和“大平原研究所”（Great Plains Institute），联络公司、工会、环保组织和其他组织，为制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进行政策建议与倡导。<sup>③</sup>

---

① “Our Story”, Breakthrough Energy, <https://www.breakthroughenergy.org/our-story/our-story>.

② CZI, “CZI Awards \$10M to Breakthrough Energy Fellows to Accelerate Promising Decarbon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Nearly \$23M to Organizations Advancing Carbon Dioxide Removal”, CZI News, <https://chanzuckerberg.com/newsroom/czi-awards-10m-to-breakthrough-energy-fellows-and-23m-to-advance-carbon-dioxide-removal/>.

③ Michael Kavate, “A New Billionaire Climate Funder: Where Chan Zuckerberg’s First Green Grants are Headed and Why”, *Inside Philanthropy*, Nov. 9, 2021, <https://www.insidephilanthropy.com/home/2021/11/9/a-new-billionaire-climate-funder-where-chan-zuckerbergs-first-green-grants-are-headed-and-why>.

表 1 扎克伯格践行“自由世界主义”的两种机制

	自由主义		世界主义			
	扎克现金	左翼议题	元连接	天秤币	卫生治理	气候变化
跨结构转化			√	√		
金智复合体	√	√			√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 1 所示，从扎克伯格一系列与“自由世界主义”有关的商业或政治行动中可以观察“跨结构转化”与“金智复合体”这两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金智复合体”机制体现在扎克现金、左翼议题、卫生治理、气候变化四个子案例中，它通过慈善捐赠资助特定的观念，使观念被大众或精英接受，推动相应的政策或现实改变。“跨结构转化”机制体现在元连接和天秤币两个子案例中，它将全球技术或生产结构的权力转化为金融和安全结构的权力。在元连接的案例中，扎克伯格一方面通过个人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将上网权利政治化（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借助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结构），在硬件上突破电信互联网的铺设障碍，并以此转化为对全球地缘政治和网络空间的影响。

## 六、结 语

本文聚焦于一群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影响力攀升的“科技精英”，从理论上探讨了他们如何实现个人化的政治影响，并通过扎克伯格的案例对该理论进行了初步检验。科技精英在国际政治中的个人影响可借助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来理解。在四种结构性权力中，科技精英呈现生产强、知识强，金融弱、安全弱的先天局面。他们凭借两种机制来突破结构限制、施加政治影响：第一种是跨结构转化，也就是将生产与知识的结构性权力横向地向金融、安全结构拓展；第二种是金智复合体，即将生产结构和知识结构中的资源用于打造金智复合体，以这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机制来影响美国和全球治理的政策议程。

从案例结果来看，公有化越高的领域，科技精英运用金智复合体的概率越大。公有化的领域包括选举和内政，以及初步形成多边主义治理框架的全球性政策，如卫生治理和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科技精英必须依循既有的政治游戏规则。通过慈善捐赠、资助观念，他们可以一定程度地影响政策制定的具体

□ 当代亚太

环节，并且不在金智复合体机制中墨守成规。老牌精英用金智复合体来资助大学、智库、媒体、司法等机构，侧重于以价值观念来影响政治。而科技精英擅长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对金智复合体进行“反向塑造”，在互联网竞选、人工智能等传统精英尚不熟悉的领域“侵入”，以黑客慈善的方式来打造更另类的金智复合体。私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科技精英进行权力跨结构转化的机遇更大。在这些新兴领域，国家的介入程度较低，科技精英更灵活，更有机遇去尝试“突破结构”，将一种结构的权力拓展至另一种结构。例如，密码学技术支持的数字货币是科技精英探索金融结构性权力的重要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很快遭到主权国家的抑制。但是在全球网络安全结构中，科技精英的结构性权力方兴未艾——扎克伯格的元连接计划深耕于传统的地面电信网络，马斯克的星链(Starlink)计划则直接走向太空，尝试用卫星信号来实现无障碍网络访问。无论哪一种图景落地，科技精英都将在网络安全结构中占据重要影响力。

从理论上讲还有一种可能：在公有化和私有化胶着的领域，科技精英也许能同时采用金智复合体、跨结构转化这两种机制，但在本文的案例中暂无体现。本文亦没有从实证上考察这两种机制的成功概率是否有差别，仅讨论了两种机制的适用场景，并详尽展示了其运作方式。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在这—方向上往前推进。

科技精英的个人影响突破了既往精英研究的框架。资本先天有突破国家限制、自由扩张的冲动，所以任何商业精英都有突破结构限制的动机。在扩张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点能使其停歇并且说“够了”，直到“应有尽有、统一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产生，即“没有事物是非我的……所有的界限障碍均被打破”。<sup>①</sup>但是传统商业精英主要通过资本来扩张，占据一些相对静态的生产结构，而科技精英既有资本，也有技术。ICT技术的特点就是可以叠加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社会子系统，他们向这些领域“高歌猛进”，扩张的深度和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这是政府忌惮他们的原因。“军工智复合体”中的军事、工业、知识精英则相反。<sup>②</sup>他们团结起来有资本和技术的优势，但他们

---

① 罗伯特·C·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刘钰森、陈开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4页。

② Alasdair Pinkerton, Stephen Young and Klaus Dodds, “Postcards from Heaven: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the Cold War 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Antipode*, Vol. 43, No. 3, 2011, pp. 820-844.

硅谷金智复合体及其“自由世界主义”议程 □

最希望保留而不是打碎国家——国家的职能越膨胀，他们越有机会扩张自身。

因此，科技精英的崛起是迥异于既往精英的，他们既有资本和技术的叠加优势，又有天然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和价值观倾向，这些思想尤其在“Z世代”中有很强的吸引力。科技精英及其金智复合体虽然不会撼动民族国家基本制度，也常在“关键赛道”上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但仍在争取对元宇宙技术下虚拟世界的“想象共同体”的领导权。技术的进步瞬息万变，推测“黑客慈善”是否会变为“黑客帝国”几乎是不现实的。但仅从逻辑上推论，具有自由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科技精英越多，对现存民族国家框架的潜在挑战也就越大。探索建立一种理性团结的“国家—精英关系”才能确保国家在“元宇宙”时代继续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

## 七、附录

表 2 拜登政府中有慈善组织背景的官员

部门	姓名	背景	机构立场	个人专长
退伍军人部（部长）	Denis McDonough	马克尔基金会	中性	人力资源
国务院（副国务卿）	Bonnie Jenkins	福特基金会	偏左	外交
国际发展（主任）	Linda Etim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中性	公共卫生
总统行政办公室	Austin Lin	陈·扎克伯格倡议	偏左	综合
总统副助理	Gautam Raghavan	吉尔基金会、拜登基金会	偏左	综合
总统副助理	Carmel Martin	爱默生集体	偏左	经济
驻联合国代表团	Michael Pan	开放社会基金会	偏左	综合
驻联合国代表团	Kaysie Brown	联合国基金会	中性	国际发展
驻联合国代表团	Marco Sanchez	联合国基金会	中性	国际发展
国务院	Ellison Laskowski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偏左	民主推广
国务院	Derek Chollet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偏左	民主推广
国务院	Sarah Cross	开放社会基金会	偏左	综合
国务院	Sue Biniiaz	联合国基金会	中性	国际发展
国土安全	Andrew Nacin	陈·扎克伯格倡议	偏左	综合
国土安全	Nadia Firozvi	民主基金	偏左	选举民主



□ 当代亚太

国家安全委员会	Austin Lin	陈·扎克伯格倡议	偏左	综合
国家安全委员会	Maren Brooks	Penfed 基金会	中性	人力资源
国家安全委员会	Jennifer Harris	休立特基金会	偏左	外交
国际发展	Bama Athreya	劳德基金会	偏左	服装行业
情报部门	David Recordon	陈·扎克伯格倡议	偏左	综合
情报部门	Sean Roche	海伦娜基金会	中性	国家安全
气候与外交政策顾问	Jonathan Pershing	休立特基金会	偏左	气候变化
能源部	Rhonda Carter	玛格丽特·凯西基金会	偏左	气候变化
能源部	Adrianna Quintero	能源基金会	偏左	气候变化
能源部	Jeremiah Baumann	彭博慈善基金会	偏左	气候变化
能源部	Aimee Witteman	麦克奈特基金会	偏左	气候变化
环境质量委员会	Jane Flegal	休立特基金会	偏左	气候变化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Ben J. Winter	加州社区基金会	偏左	综合
住房和城市政策助理	Erika Poething	麦克阿瑟基金会	偏左	经济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Ben Winter	加州社区基金会	偏左	经济
小商业部门	Michele Chang	马克尔基金会	中性	IT
司法部	Melanca Clark	哈德逊·韦伯基金会	偏左	种族平等
司法部	Anne Milgram	阿诺德基金会、世纪基金会	偏左	刑事司法
数字服务	Andrew Nacin	陈·扎克伯格倡议	偏左	综合
商务部	Michele Chang	马克尔基金会	中性	经济
人事管理办公室	David Marsh	马克尔基金会	中性	IT
人事管理办公室	Kiran Ahuja	西北慈善	中性	人力资源
农业部	Janie Simms Hipp	美洲原住民农业基金	中性	农业
内政部	Molly McUsic	威斯基金会	偏左	环境保护
副内阁秘书	Cristóbal Alex	开放社会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偏左	人力资源
副幕僚长	Bruce Reed	博德基金会	中性	综合
妇女局	Wendy Chun-Hoon	开放社会基金会	偏左	基层运动
财政部	Jay Williams	哈特福德公益基金会	偏左	种族平等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相关资料自制，参见“Joe Biden Presidential Transition”，Ballot Pedia，  
[https://ballotpedia.org/Joe\\_Biden\\_presidential\\_transition#Agency\\_review\\_teams](https://ballotpedia.org/Joe_Biden_presidential_transition#Agency_review_teams)

of small state water diplomacy strategies: “autonomous water diplomacy”, “aligned water diplomacy”, “hedged water diplomacy” and “collective water diplomac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mall state water diplomacy,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dynamics shaping the water diplomacy of Mekong countries and identifies the modalities that small states follow in their strategies considering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nsity of Sino-U. S. competition.

**Key Words:** Theory of Water Diplomacy; Small State Water Diplomacy; Mekong Countries; Sino-U. S. Competition; Lancang-Mekong River

**About the Authors:** Zhang Li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Belt and Road & Global Governance at Fudan University; Wu Boxun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Institute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Issues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Silicon Valley’s Liberal Cosmopolitan Agenda and the Golden Knowledge Complex**

Yin Peiqiu

**Abstract:** The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has brought economic prosperity, while enhancing digit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tates. It has also empowered a group of “tech elites” centered in Silicon Valley. Leading tech elites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t political preferences, which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ir influence? And what theory should be applied to explain it? Existing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system and state levels, while overlooking or underestimating the role that individual elites can assert with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structural power to explain the personal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elites. Technology elites wield significant power vis-à-vis systems of production and knowledge structures, while their influence is weak vis-à-vis financial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Tech elites can either transfer their power across different structures, or leverage the “Money Idea Complex” to achieve political influence. Combining these two forms of influence, tech elites are able to advance a “liberal cosmopolitan” political agenda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Six Leadership Lessons of Meta Company CEO Mark Zuckerberg,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logic behind this process. While tech elites will not succeed in shaking the basic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based system, they are still seeking leadership power through decentralized network activities and virtual reality (metaverse) spaces in the Web3.0 era. As the ranks of tech elites with liberal cosmopolitan ideologies exp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represent a greater challenge to the nation-state-based system.

**Key Words:** Digital Mutual Dependence; “Golden Knowledge Complex”; Structural Power; Liberal Cosmopolitanism; Metaverse

**About the Author:** Yin Peiqiu is a Juni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 **Reassessing U. S. Limited Nuclear War Theory in the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asic Logic, Policy Debates and Realistic Impact**

Li Xiang and Gao H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